

未吸收冗余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高管社会资本的视角



□曹红军 陈 元

[福州大学 福州 350108]

[摘 要] 围绕企业冗余资源的存在是否必要及其通过何种机制才能创造最大组织绩效的问题,以我国沪深两市159家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了未吸收冗余、竞争行为多样性与企业绩效的分析框架,同时将高管的社会资本纳入研究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未吸收冗余通过提高竞争行为的多样性促使了企业绩效的提升;高管学术资本增强了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高管政府资本削弱了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

[关键词] 未吸收冗余; 竞争行为多样性; 学术资本; 政府资本; 文本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4071/j.1008-8105(2018)-5009

Relationship between Unabsorbed Slack and Firm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MT Social Capital

CAO Hong-jun CHEN Yuan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necessity for firms to keep slack and how can enterprises use these resources to create the biggest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data of 159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a model with unabsorbed slack, competitive behavior diversity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s constructed, and manager's social capital was also includ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unabsorbed slack improves firm performance by increasing the diversity of competitive behavior; the academic capital play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absorbed slack and firm performance; governmental capital weaken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absorbed slack and the firm performance.

Key words unabsorbed slack; competitive behavior diversity; academic capital; governmental capital; text-based analysis

一、问题提出

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和落后产能淘汰,冗余资源的大量囤积成了大多数企业面临的现状^[1]。通常来说,理论界和实业界都认为冗

余资源能够帮助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降低经营风险,将其视为企业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然而,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冗余资源持一种更为消极的态度,认为其会引发经理人员的投机行为,使高管安于现状错失企业发展机会,进而损害企业利润^[2]。因此,在管理

[收稿日期] 2018-11-08

[作者简介] 曹红军(1978-)男,管理学博士,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陈元(1994-)女,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实践过程中倾向于大幅度缩减组织冗余^[3]。

冗余资源的存在是否必要?显然,理论界和实业界对这一问题均未达成一致意见。本研究认为这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冗余资源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存在显著差异,多数研究混淆各类冗余,笼统地探究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做法有待商榷^[4]。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聚焦于冗余资源与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忽视了高管在二者转换过程中可能承载的中介机制和权变作用^[5],即企业究竟该如何利用这些冗余才能创造最大组织绩效的问题。事实上,高管团队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主体,其配置冗余资源的方式决定了企业对竞争行为的选择。同时,高管丰富的社会资本又能增强企业与外界的交流合作,捕获政府及市场信息,提高企业配置资源的灵活性。

据此,本研究重点关注对上述问题的理论阐释,立足沪深两市高科技企业,旨在说明未吸收冗余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它促使企业绩效提升的逻辑过程。具体而言,本文试图以“资源-行为-绩效”的逻辑打开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黑箱。并基于当前各高科技企业热衷于聘任知名学者、专家、政府官员等社会名流作为企业高管的现实情境^[6],将高管的学术资本和政府资本纳入研究框架,深入探索高管社会资本对冗余资源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

冗余资源是指在一定周期内,组织拥有的过剩的、暂时闲置的资源^[7]。它以多种形式存在于企业之中,本文基于Tan和Peng的研究成果将其划分为已吸收冗余和未吸收冗余两个类别。具体而言,已吸收冗余是指已被组织吸收但可以通过重组或重构等方式重新利用的资源,如组织冗员、闲置的机器设备等;未吸收冗余是指企业暂未投入使用但能快速运用到企业各项活动中的高弹性资源,如过量的货币资金、应收账款等财务资源^[8]。与已吸收冗余相比,未吸收冗余灵活性更高、管理者的自主权更大^[5],但当前对它的研究却相对缺乏。因此,本文选取企业未吸收冗余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其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机制和情境因素。

根据资源基础观的逻辑,各种稀缺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组成部分^[9],资源富足的企业在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竞争对手的攻击时会表现出独特的竞争优势。本文认为未吸收冗余作为企业兼

具灵活性和流动性的特殊资源,至少会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第一,未吸收冗余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4]。这些富余的财务资源不仅能够保障现有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而且也是企业不断开拓新业务、新领域的物质基础;第二,未吸收冗余能够有效地消除组织员工在激烈竞争中的紧张感,降低员工因争夺资源而引发的矛盾和恶性竞争^[10],有助于团队成员的沟通交流;第三,富余的未吸收冗余提高了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有利于企业创新氛围的培养。在这种环境下,企业的创新动力被激发^[11],研发投资的力度显著增强^[4],促使了企业绩效的进一步增长。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未吸收冗余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作用。

(二) 竞争行为的中介作用

1. 未吸收冗余与竞争行为

拥有相似资源的企业为何绩效状况不尽相同?Miller等学者指出企业的竞争行为有助于我们解开这一谜团,即企业的资源禀赋会影响它对竞争行为的选择^[12]。当企业的未吸收冗余不足时,企业的核心任务是维持自身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面对竞争对手的攻击它甚至会因选择减少额外开支、降低生产成本而回避竞争^[13],此时竞争行为的多样性处于较低的水平;随着企业未吸收冗余的逐渐增多,企业竞争行为的多样性程度也会逐渐提高。这是因为,一方面,未吸收冗余的变现能力强、流动性大,是企业实施多样性竞争行为的关键保证。它给企业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投资机会,企业通过与先进技术、外部环境和行业巨头的充分接触增强了学习能力和竞争意识^[14];另一方面,丰富的未吸收冗余增加了企业的自主选择权,他们不会过度依赖于某个供应商、合作伙伴或其他利益相关者^[15],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采取多样化的竞争行为。与竞争对手相比,这种资源优势增加了企业参与竞争和回应竞争的动机^[16],有效提高了竞争行为的多样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未吸收冗余对竞争行为的多样性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作用。

2. 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

在超竞争环境下,单一的竞争行为会限制企业追求新机会和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而多样化的竞争行为能通过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绩效。首先,多样化的竞争行为会向外部群体释放企业资源丰富、具有潜力的信号,这种信号有助于企业在市

场上建立良好的声誉^[17]并获得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青睐,使企业相较竞争对手而言被视为更有能力。其次,多样性的竞争行为往往因包含了多种资源和策略的组合,加大了竞争对手模仿的难度,竞争对手需要较长的反应时间^[18],其反击意愿大大降低^[19],是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最后,当采取多样性的竞争行为时,企业可以同时兼顾多个领域多种方向,降低经营风险,也为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学习机会。在学习和总结与不同竞争对手对抗的经验之后,企业能够清楚地判断哪些竞争行为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14],进而在后续竞争中准确实施有效的竞争战略。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竞争行为的多样性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企业的未吸收冗余会通过增强企业的学习能力、竞争意识和自主选择权激励企业采取多样化的竞争行为,而多样化的竞争行为又会通过建立市场声誉、获取信任、降低可替代程度和分散风险的方式提高企业绩效。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竞争行为的多样性对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中介作用。即未吸收冗余通过提高企业竞争行为的多样性程度,进而提高企业绩效。

(三) 企业高管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1. 学术资本的调节作用

企业高管的社会资本是指高管凭借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所获取的无形资源,这些资源在中国的“关系”文化背景下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中,高管在大学、科研院等学术研究机构任职经历是其学术资本的主要来源^[20]。于企业内部而言,学术资本是高管学识和能力的象征,奠定了他们在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权威性,往往在企业中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21],受到组织员工的尊敬与认可,有利于组织团结和高效合作;于企业外部而言,由这些高管的社会网络所形成的“无形学院”是企业与外界交流、合作的基础^[22],它拓宽了企业的视野,加强了企业利用未吸收冗余整合资源以应对竞争的动机和能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学术资本正向调节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即企业高管的学术资本越多,未吸收冗余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大。

2. 政府资本的调节作用

企业高管在政府等相关部门的任职经历是其政府资本的主要来源^[6]。一般而言,高管的政府任职经历会产生较强的沉淀性权力^[22],也就是说一些官员离职从商后,其原有的政治人脉和关系依然留存。

这些丰富的政府资本可以减少政企间的信息不对称性^[23],帮助企业获取更多有价值的资源和信息^[24]。此外,这些政府资本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25],企业抵抗外界环境变动的能力增强,未吸收冗余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凸显。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政府资本正向调节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即企业高管的政府资本越多,未吸收冗余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大。

根据上述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本研究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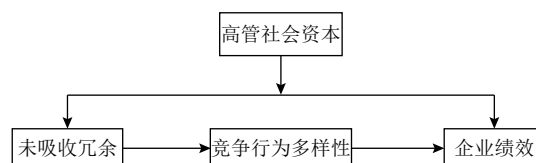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 样本选择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化学纤维、医药、计算机通信设备、汽车、铁路船舶航天航空等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作为研究的初始样本,研究区间为2012~2016年。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本文参考相关研究对其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2010年及以后上市的公司,这是因为刚上市的公司经营状况不稳定;(2)剔除ST类、ST*类以及已退市的公司,以此消除财务状况异常或公司出现重大变动的非常规现象的影响;(3)剔除企业高管个人资料、财务数据、公司年报不全或无法获取的公司。最终选取159家上市公司作为有效研究对象,共计795个有效样本。

本研究主要通过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以及巨潮资讯网等方式获取相关数据。其中资产回报率、流动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净资产收益率、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及销售收入等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企业高管基本资料来源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公司年报则是从巨潮资讯网上下载手工整理而得。

(二) 变量测量

1. 企业绩效(Firm Performance)

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资产回报率(ROA)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指标^[2~7]。考虑到冗余资源、竞争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潜在的滞后效应,

本文将企业绩效的数据时期滞后一年, 即为2013~2017年。

2. 未吸收冗余 (Unabsorbed Slack)

当前学者提出了多种测量冗余资源的方法, 主要包括财务指标、问卷以及非财务指标三种方式^[3]。考虑到本研究对冗余资源的界定和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选择基于财务数据的度量方法, 采用企业流动比率衡量未吸收冗余^[2], 该指标值越大表明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越强, 短期偿债能力亦越强; 反之则弱。

3. 竞争行为的多样性 (Competitive Behavior Diversity)

现有研究主要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测量企业的竞争行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采用企业年报作为文本分析的基础, 首先研究小组共同探讨并确定竞争行为的关键词, 然后运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0测出关键词的频率, 在剔出有歧义的语句之后再次计算关键词的覆盖率以此测量企业的竞争行为。最后运用赫芬达尔类型指数计算各企业竞争行为策略组合的多样化程度^[14]。具体公式如下:

$$CBD = 1 - \sum_i P_i^2, i = 1, 2, 3, 4, 5, 6$$

(1)

其中 P_i 是指第 i 类竞争行为的比例。CBD数值越大, 表示竞争行为多样性程度越高, 即企业实施了多种类型的竞争行为; CBD数值越小, 表示竞争行为多样性程度越低, 即企业只利用了狭窄范围的行为组合。

4. 社会资本

学术资本 (Academic Capital)。本研究借鉴朱丽等学者的方法以具有高校、科研院任职背景的高管人数占比作为学术资本的衡量指标^[6], 解决了过去只考虑存在与否而忽略数量差异的问题^[26]。

政府资本 (Governmental Capital)。同样, 本文以具有政府任职等相关背景的高管人数占比作为政府资本的衡量指标^[6]。

5. 控制变量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准确有效, 本文选取运营效率、净资产收益率和已吸收冗余资源三个指标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运营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和灵活性, 研究表明运营效率越高, 企业未吸收冗余资源越多^[27]; 净资产收益率体现了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 是衡量企业获利能力的重要指标^[2], 企业当期获利能力对其利用冗余资源的方式和竞争战略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 已吸收冗余是相对未吸收冗余而言的, 是指已被组织系统吸收但可以通过重组、重构等方式被企业重新利用

的资源^[23]。因此, 本文在立足于现实情境重点关注企业未吸收冗余的同时需要对已吸收冗余加以控制。各变量的名称及具体的测量方法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名称与测量方法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测量方法
因变量	企业绩效	ROA	资产回报率, 净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
自变量	未吸收冗余	UAS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
中介变量	竞争行为多样性	CBD	见公式 (1) 及其描述
调节变量	学术资本	AC	有高校、科研院任职背景的高管人数占比
	政府资本	GC	有政府任职等相关背景的高管人数占比
	运营效率	OE	总资产周转率, 销售收入与总资产的比值
控制变量	净资产收益率	ROE	税后利润与所有者权益的比值
	已吸收冗余	AS	(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收入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2列出了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由表2可知企业未吸收冗余水平较高 ($M=2.838$), 分析其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以创造更多利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竞争行为多样性程度较高 ($M=0.817$) 且企业之间的差异较小 ($SD=0.013$), 说明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大部分企业都倾向于采取多样化的竞争行为。此外, 学术资本强度的均值为0.474, 政府资本强度的均值为0.210, 表明公司学术资本和政府资本的强度较大。从相关性结果来看, 未吸收冗余、竞争行为的多样性均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 各控制变量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 说明本文对控制变量的选取合理有效。

(二) 回归结果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 本研究对所涉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 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最大值为1.23, 最小值为1.01, 远小于10。因此, 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28], 可以进行后续的回归分析和假设检验。

如表3所示, 首先将控制变量放入模型1,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模型 (M2) 以检验假设1。结果表明, 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b=0.247$), 假设1得到验证。

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1.OE	0.735	0.364	1							
2.ROE	8.531	13.015	0.159***	1						
3.AS	0.220	0.149	-0.329***	0.067*	1					
4.UAS	2.838	3.495	-0.236***	0.148***	0.211***	1				
5.CBD	0.817	0.013	0.011	0.075**	0.015	0.126***	1			
6.AC	0.474	0.293	0.061*	0.128***	0.017	0.035	0.026	1		
7.GC	0.210	0.230	0.031	-0.023	0.005	0.048	0.072**	0.057	1	
8.ROA	7.428	7.212	0.121***	0.804***	0.170***	0.289***	0.104***	0.123***	-0.049	1

注：***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表 3 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

	M1 (ROA)	M2 (ROA)	M3 (CBD)	M4 (ROA)	M5 (ROA)
OE	1.542***	1.970***	0.00387**	1.473***	1.905***
ROE	0.357***	0.357***	0.00018	0.356***	0.357***
AS	5.459***	5.289***	-0.00505	5.551***	5.366***
UAS		0.247***	0.00029*		0.239***
CBD				22.637**	19.179*
Constant	2.049***	1.072*	0.814***	-16.410*	-14.543
R-squared	0.658	0.684	0.02	0.660	0.685

注：***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为了检验假设2~4，本文构建了模型3、模型4和模型5，通过层次回归的方法验证竞争行为对未吸收冗余和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由模型3可知，未吸收冗余与竞争行为的多样性显著正相关（ $b=0.00029$ ， $p<0.1$ ），假设2成立。模型4表明，竞争行为多样性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在0.05的水平上显著（ $b=22.637$ ），假设3得到验证。最后，如模型5所示，将竞争行为多样性放入回归模型之后，未吸收冗余对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由0.247（ $p<0.01$ ）变成了0.239（ $p<0.01$ ），说明原有的相关关系被中介变量削弱，竞争行为承载部分中介的作用，假设4得到验证。

为了检验企业高管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本文构建了模型6~9，如表4所示。在计算乘积项之前，本文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29]，以减小回归方程中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由模型6和模型7可知企业高管的学术资本正向调节了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b=0.241$ ， $p<0.1$ ），假设5得到验证。由模型8和模型9可知，企业高管的政府资本在0.01的水平显现了对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与假设6相反。为了更加清晰地表明高管社会资本对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绘制了调节作用的交互效应图，详见图2，图3。

表 4 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

ROA	M6 (ROA)	M7 (ROA)	M8 (ROA)	M9 (ROA)
OE	1.968***	1.976***	1.200***	2.042***
ROE	0.357***	0.360***	0.357***	0.357***
AS	5.274***	5.423***	5.317***	5.404***
UAS	0.246***	0.248***	0.251***	0.316***
AC	0.200	0.249		
UAS*AC		0.241*		
GC			-0.900	-0.925
USA*GC				-0.478***
Constant	0.987	0.876	1.221*	1.007
R-squared	0.685	0.689	0.686	0.699

注：***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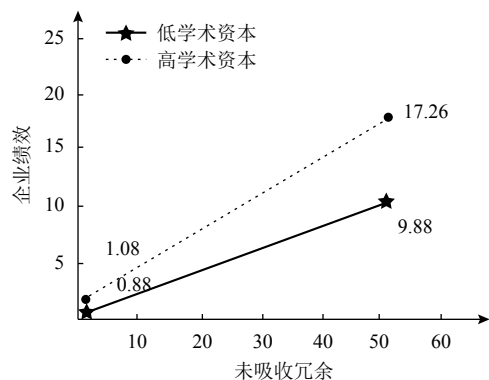


图2 学术资本的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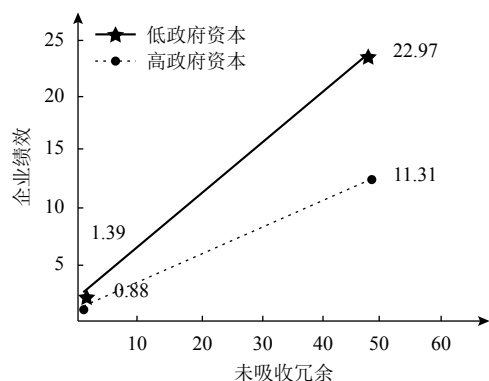


图3 政府资本的调节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的基本结论

通过对我国沪深两市159家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未吸收冗余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企业应该增加对未吸收冗余的持有量。本研究基于Tan和Peng的研究将冗余资源划分为已吸收冗余和未吸收冗余两个类别^[8],并选取灵活性更高、管理者的自主权更大^[5]且当前研究相对薄弱的未吸收冗余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弥补了过去笼统地认为冗余资源促进或阻碍企业绩效等一类研究的不足。

第二,竞争行为在未吸收冗余向企业绩效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未吸收冗余通过提高竞争行为的多样性提高企业绩效。本文响应了Ndofor等学者提出的“未来研究要进一步探索企业资源(人力资源、财务资源)与竞争行为关系”的号召^[14],以“资源-行为-绩效”的逻辑打开了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关系的黑箱。

第三,企业高管的学术资本和政府资本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基于中国特有的“关系”文化,本文尝试性地探索了高管社会资本对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管学术资本越

多,未吸收冗余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大;高管政府资本的积极作用在本研究情境中并没有显现,反而削弱了未吸收冗余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高管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的矛盾促使了寻租行为的发生^[22],并且高管为维持强政治关系所付出巨大的代价^[23]也会弱化未吸收冗余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

(二) 对企业管理实践的启示

本文对管理实践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文肯定了未吸收冗余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部分企业大幅度缩减冗余的行为显然是不明智的。未吸收冗余不仅可以给企业提供稳定的经营环境和拓展业务的物质基础,也有利于改善员工关系、缓解矛盾和冲突,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

其次,运用未吸收冗余实施多样化的竞争行为是一条促使组织冗余转化为绩效产出的有效途径。多样化的竞争行为既可以提高企业应对竞争对手攻击的能力,又可以为企求更多创新活动和投资机会,使企业在市场上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

最后,企业要合理利用高管的学术资本,与外界科研机构建立密切的联系,保持企业持续学习的能力以及创新与研发的热情;此外,企业需充分认识政府资本的利弊,警惕高管的寻租行为,加强监督并倡导以企业整体利益为主的企业文化。

(三) 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仍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改进。(1)本文虽然验证了竞争行为多样性的中介作用,但数据表明它仅是部分中介,未来研究可以探索其他中介变量以丰富未吸收冗余影响企业绩效的中间机制。(2)关于高管社会资本的测量。本文虽然弥补了过去研究只考虑存在与否而忽略数量差异的问题,但是没有区分不同等级的社会资本影响。尤其是于政府资本而言,不同级别的权力和作用存在差异,未来研究需要改进和完善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

参考文献

- [1] 于晓宇,陈颖颖,蔺楠,等.冗余资源、创业拼凑和企业绩效[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9(4): 52-62.
- [2] 蒋春燕,赵曙明.组织冗余与绩效的关系:中国上市公司的时间序列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4(5): 108-115.
- [3] 廖中举,黄超,姚春序.组织资源冗余:概念、测量、

成因与作用[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6, 38(10): 49-59.

[4] 陈爽英, 杨晨秀, 邵云飞. 组织冗余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6, 28(5): 55-62.

[5] 李宁娟, 高山行. 未吸收冗余、环境扫描、探索式创新——基于企业内外部因素调节作用的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7, 38(1): 108-119.

[6] 朱丽, 柳卸林, 刘超, 等. 高管社会资本、企业网络位置和创新能力——“声望”和“权力”的中介[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7, 38(6): 94-109.

[7] BROMILEY P. Testing a causal model of corporate risk taking and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1, 34(1): 37-59.

[8] TAN J, PENG M W. Organizational slack and firm performance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s: Two studies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13): 1249-1263.

[9] 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 99-120.

[10] CHENG J L C, KESNER I F. Organizational slack and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shifts: The impac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patter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7, 23(1): 1-18.

[11] TROILO G, DE LUCA L M, ATUAHEN-GIMA K. More innovation with less? A strategic contingency view of slack resources, information search, and radical innovation[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4, 31(2): 259-277.

[12] MILLER D, CHEN M J.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competitive inertia: A study of the U.S. airline industr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4, 39(1): 1-23.

[13] 李晓翔, 刘春林. 困难情境下组织冗余作用研究: 兼谈市场搜索强度的调节作用[J]. 南开管理评论, 2013, 16(3): 140-148.

[14] NDOFOR H A, SIRMON D G, HE X. Firm resources, competitive actions and performance: Investigating a mediated model with evidence from the in-vitro diagnostics industr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32(6): 640-657.

[15] MILLER D, CHEN M J. Nonconformity in competitive repertoires: A sociological view of markets[J]. Social Forces, 1996, 74(4): 1209-1234.

[16] GEORGE G. Slack resourc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rivately held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48(4): 661-676.

[17] BASDEO D K, SMITH K G, GRIMM C M, et al. The impact of market actions on firm reputation[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27(12): 1205-1219.

[18] FERRIER W J. Navigating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The drivers and consequences of 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4): 858-877.

[19] 卫武. 企业非市场与市场行为及其竞争特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09, 12(2): 37-51.

[20] 罗进辉. 独立董事的明星效应: 基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考察[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 17(3): 62-73.

[21] 刘林青, 甘锦锋, 杨锐. 探寻中国管理国际研究的“无形学院”——基于SSCI期刊(1978~2010年)的社会网络分析[J]. 管理学报, 2014, 11(9): 1276-1286.

[22] 谢志明, 易玄. 产权性质、行政背景独立董事及其履职效应研究[J]. 会计研究, 2014(9): 60-67.

[23] 陈爽英, 杨晨秀, 井润田. 已吸收冗余、政治关系强度与研发投入[J]. 科研管理, 2017, 38(4): 46-53.

[24] 罗明新, 马钦海. 公司政治关联国外研究新进展[J]. 预测, 2011, 30(2): 77-80.

[25] 余明桂, 潘红波.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 管理世界, 2008(8): 9-21.

[26] 沈艺峰, 王夫乐, 陈维. “学院派”的力量: 来自具有学术背景独立董事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 2016(5): 176-186.

[27] 李晓翔, 刘春林. 高流动性冗余资源还是低流动性冗余资源——一项关于组织冗余结构的经验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7): 94-103.

[28] 陈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29] 陈晓萍, 徐淑英, 樊景立.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 第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编辑 刘波